

国际传播视野中的中国故事叙事之道

——“第一主讲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涵的国际分享

赵 欣

内容提要 通过具体、微观的故事可以阐释人类信念体系中一个宏观而抽象的意义。运用内容分析法考察习近平作为“第一主讲人”在国际外交场合讲述的中国故事可以发现，中国故事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不仅揭示中国人这一群体原型的典型身份特征，而且有助于使国际受众更深入地洞察历史和现在的中国，并对未来中国的预期和想象提供隐喻和可能的方向。融通中外的故事具有“对话性”和“主体间性”的叙事特征，讲述这些故事有助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彼此间的连接，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困惑和偏见，融会“既中国又世界”的价值观念体系。国际传播语境当中，那些承载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中国故事、反映不同文明交相辉映和交流互鉴的融通中外的故事，是增进中外人民相互了解和认知、推动不同文明对话、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力量。

关键词 中国故事 身份建构 融通中外 对话性 主体间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引言

人的生命历程通过个人叙事才能达到在社会、文化和历史上的连续性和连贯性^①。人类社会是一个基于故事而形成的虚拟共同体^②。人们通过故事来理解世界、阐释世界^③，并以此理解生命历程的意义^④。一切皆可为故事，故事有着各种形式^⑤，具有分享经历、呈现观点、建构身份的功能^⑥，在回答“我是谁”、“我为何成为现

① Cohler, B. J., "Personal Narrative and Life Course," in Paul B. Baltes & Orville G. Brim, eds., *Life 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vol. 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pp. 205 - 241.

② (以) 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56-259页。

③ Richardson, L., "Narrative and Soci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vol. 19, no. 1, 1990, pp. 116 - 135.

④ 参见 Thorne, A., & Nam, V., "The Life Story as a Community Project," *Human Development*, vol. 50, 2007, pp. 119 - 123.

⑤ 参见 Toolan, M., *Narrative: A Critical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⑥ Norrick, N. R., "Conversational Storytelling," in David Herman,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27 - 141.

在的”、“我的未来将指向何方”等关于“自我”的基本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叙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有研究表明,中国最早的叙事出现在商代卜辞和周代诗经之中。叙事与新闻传播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三国志·魏书》,其所记载的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体现了新闻的非虚构叙事特征^①。近些年来,中国领导人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系统阐述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标、体系和路径,提出“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等问题意识和现实意义突出的论述。

“讲好中国故事”是构建一套以中国传统文化源流为基础并结合当下中国经验的新的话语体系的一种尝试^②。通过具体、微观的故事可以阐释人类信念体系中一个宏观而抽象的意义。故事承载着一个或几个宏观命题(macro-propositions),这些宏观命题可以进一步凝练为一个抽象概念(concept)。在前人的基础上,本文将抽象概念分为两个类别。其一,抽象且内涵明晰的概念,可以通过短小精悍的叙事来界定和呈现这个概念。其二,抽象且富有争议的概念,概念越是复杂,构成概念的叙事话语越是多种多样。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即是一个抽象且内涵明晰的概念。其内涵要义是每个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应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③。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根据概念、命题和故事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第一,抽象概念应当具有明确的内涵,故事所承载的宏观命题的涵义也应有明确的界定,使之能够通过具体而微观的故事清晰地呈现出来,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命题并非一定要以显性的形式呈现在故事当中,故事讲述者可以以隐含的方式在文本里预设这样的命题。在讲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抽象概念的故事时,故事中不一定要出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词,但至少应包含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能够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的一个要素。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故事中的一个要素,它界定了故事中所有要素的形式。第三,如果多个故事涵盖同一个(些)宏观命题,那么通过不同的故事来阐述这个(些)命题,就

① 陈燕侠 《叙事之“道”:中国故事的“中国式讲述”》,《新闻爱好者》2019 年第 2 期,第 75 页。

② 吴宗杰、张崇 《从〈史记〉的文化书写探讨“中国故事”的讲述》,《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 年第 5 期,第 20 页。

③ 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2 日,2 版。

④ 习近平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0893328。

使这个（些）命题获得了文本间的意义。第四，抽象概念不仅能够用以阐释当前的文本，而且可以阐释其他相类似的文本。命题一旦在受众头脑中建构起来，就可能存入长时记忆，成为阐释其他文本的一种策略（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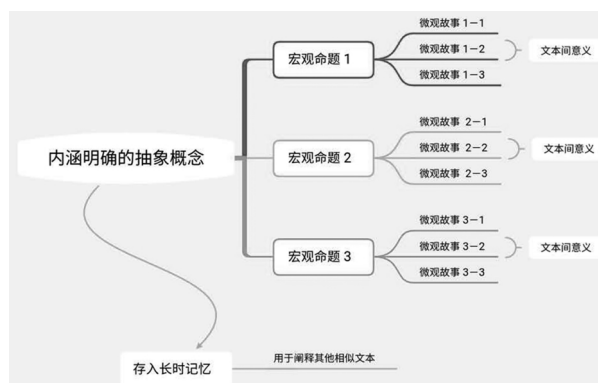


图1 概念、命题和故事三者之间的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和提炼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①。《尚书·虞书·尧典》中的“协和万邦”、《礼记·礼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大学》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墨子·兼爱上》的“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荀子·天论》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的“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抱朴子·外篇·博喻》的“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等中国典故所蕴涵的中华民族崇尚“天下一家”的智慧哲理，对和平、和睦、和谐的精神追求，以及“美美与共”的文化情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源泉。故事可以“载道”，正如孔子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②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即将“道”贯穿于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③，将其升华为“共同体”层面的人类经验。

故事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人们用故事呈现过往经历时，往往将故事与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④，故事所蕴含的深层次文化表征在集体记忆的建构

① 习近平 《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2版。

② 司马迁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④ Schiffrin, D., "Narrative as Self-portrait: Sociolinguistic Constructions of Identity," *Language in Society*, vol. 25, no. 2, 1996, p. 167.

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故事产生于前人叙述的基础上,故事讲述者在内容上与前人的版本相协调、相一致,使故事体现出连续性和连贯性的叙事意义。因此,有学者提出,“中国故事”是凝聚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能够在经验与情感上触及当代中国的真实与中国人的内心真实^①。通过故事一个民族界定自己的起源,一个社会界定自己的认同^②。同时,故事具有情境化、语境化的叙事特征。故事是在特定的互动情境下、面对特定受众、在讲述者和受众的特定关系当中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③。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是由讲述者和受众共同完成的^④,需要纳入广泛、多元、协商合作的跨国互动机制来评估中国故事的传播实践与效果^⑤。本文尝试将故事的社会文化表征以及情境化互动特征联结在一起,以国际传播语境当中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个案为研究对象,以内容分析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中国故事个案的基本面貌,考察其讲故事的特点和方式,并以此探讨这一国际传播实践当中中国故事的意义建构功能和叙事表征。

二、文献回顾

叙事作为用语言来呈现和表征经验以及将经验与具体的语境勾连在一起的一种能力为自我呈现和身份呈现提供了重要资源^⑥。布鲁·库尔卡(Blum-Kulka)提出,叙事通过故事本身(a tale)和经历分享(the telling of an experience)来呈现讲故事人自己^⑦。身份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故事的内容、形式以及讲述方式不仅反映个体的特征,而且也揭示个体的社会和文化身份。希夫林(Schiffrin)认为,讲故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画像(self-portrait),通过语言的透镜(linguistic lens),人们认识到自己如何看待处于特定社会结构当中的自我^⑧。

① 李云雷 《何谓“中国故事”》,《人民日报》2014 年 1 月 24 日,24 版。

② 李希光 《人类需要瞬息的丑闻,更需要永恒的故事》,《青年记者》2012 年第 22 期,第 28 页。

③ 参见 Georgakopoulou, A., *Small Stories, Interaction and Identitie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7; Georgakopoulou, A., “Small Stories Transposition and Social Media: A Micro Perspective on the ‘Greek Crisis’,” *Discourse & Society*, vol. 25, no. 4, 2014, pp. 519 – 539; De Fina, A., “Who Tells Which Story and Why? Micro and Macro Contexts in Narrative,” *Text & Talk*, vol. 28, no. 3, 2008, pp. 421 – 442; Ryan, M., “Small Stories, Big Issues: Tracing Complex Subjectivitie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Interactional Talk,”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vol. 5, no. 3, 2008, pp. 217 – 229; Souto-Manning, M., “Critical Narrative Analysis: The Interplay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Analy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vol. 27, no. 2, 2014, pp. 159 – 180.

④ 徐占忱 《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策》,《社会主义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22 页。

⑤ 王昀、陈先红 《迈向全球治理语境的国家叙事——“讲好中国故事”的互文叙事模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 年第 7 期,第 32 页。

⑥ Schiffrin, D., “Narrative as Self-portrait: Sociolinguistic Constructions of Identity,” *Language in Society*, vol. 25, no. 2, 1996, p. 167.

⑦ Blum-Kulka, S., “You Gotta Know How to Tell a Story: Telling, Tales, and Tellers in American and Israeli Narrative Events at Dinner,” *Language in Society*, vol. 22, 1993, pp. 361 – 402.

⑧ Schiffrin, D., “Narrative as Self-portrait: Sociolinguistic Constructions of Identity,” *Language in Society*, vol. 25, no. 2, 1996, pp. 167 – 203.

在群体间交往中,不同群体作为独立存在的实体,根据群体边界来界定自身的特点,在与其他群体的交流互动中确立群体身份和群体意识。叙事具有建构和协商群体身份的功能,不仅呈现历时维度自身所属群体身份的形成、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且揭示共时维度其独特性和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不同之处。布舒茨(Bucholtz)和霍尔(Hall)提出相即性(adequation)和相异性(distinction)作为身份形成过程中的两种互动协商策略。相即性强调个体与某一特定身份之间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相异性凸显个体与某一特定身份之间的差异性(而非相似性)。相即性和相异性作为交流互动中的协商策略,所凸显的身份特征与特定的语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既承认身份的多元性,又承认在一个特定语境下某种身份更具显著性^①。

叙事的功能还体现为对于身份意义的揭示^②,产生于特定社会情境中的短小而多元的故事是个体和集体建构身份的手段,而对这些故事的解读即是对故事所建构的身份意义的解读^③。根据波尔金霍恩(Polkinghorne)等人的观点,叙事是达到完整的自我认识的一种途径^④。人们通过讲故事将自身经历赋予意义的过程也为理解自我提供了基础。沿着巴特利特(Bartlett)的“群体中的记忆”的思路(“memory in the group”,而非“memory of the group”)^⑤,威尔士(Wertsch)提出,叙事是集体记忆的文本资源,集体记忆通过零散分布的(distributed)叙事呈现出来^⑥。有鉴于此,本文以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国际传播实践个案为研究对象,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1: 在这一典型个案中,中国故事对于中国人的群体身份建构发挥着何种作用? 对于理解中国人的群体身份起着怎样的作用?

与此同时,群体身份具有主体间性基础,自我只有在社会交往中将自己视为他者的客体时才会展现出来,身份只有在互动的框架内相对于其他群体身份才能凸显其意义。群体身份的叙事基础并不是“独白式的”,而是在与更大的“共同体”或

① Bucholtz, M. & Hall, K.,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Alessandro Duranti, eds., *A Compan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pp. 369 – 394; Bucholtz, M. & Hall, K., “Identity and Interaction: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Discourse Studies*, vol. 7, no. 4 – 5, 2005, pp. 585 – 614.

② McLean, K. C. & Pratt, M. W., “Life’s Little (and Big) Lessons: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the Turning Point Narratives of Emerging Adulthoo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42, no. 4, 2006, pp. 714 – 722.

③ Jabal, E. & Rivière, D., “Student Identities and/in Schooling: Subjection and Adolescent Performativity,”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vol. 28, no. 2, 2007, pp. 197 – 217.

④ Polkinghorne, D.,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 Albany: SUNY Press, 1988; Bluck, S., & Alea, N., “Exploring the Functions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Why Do I Remember the Autumn?” in Jeffrey Dean Webster & Barbara K. Haight, eds., *Critical Advances in Reminiscence Work: From Theory to Application*, New York: Springer, 2002, pp. 61 – 75; Bluck, S., & Habermas, T., “The Life Story Schema,” *Motivation and Emotion*, vol. 24, 2000, pp. 121 – 147; Pillemer, D., *Momentous Events, Vivid Memo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⑤ Bartlett, F. C.,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32], p. 294.

⑥ Wertsch, J. V., “The Narrativ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ETHOS*, vol. 36, 2008, pp. 120 – 135.

“超级群体” (superordinate group)^① 及其所规约的“互动仪式” (interaction rituals) 的对话中形成的。

纵观历史, 历代经过反复检验的故事不仅诠释自身所属群体身份, 而且还讲述其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不仅从历时角度呈现内群体从何处而来、将向何处去, 而且从共时视角阐释不同群体间如何结集成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超级群体, 建立彼此理解、尊重和信任的关系, 从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故事可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的价值观、文化和社会准则^②。故事的国际分享是相互理解的开端, 故事担当着不同文化间的“黏合剂”^③。在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时, “我”只是故事的共同作者 (co-author) 之一, “我”为自己建构的叙事是超越自我的宏大叙事的一个部分。人类在彼此讲故事的过程中找到最深挚的友谊, 通过国家叙事, 人们从深层次上了解彼此——超越纯粹的差异, 形成建设性关系, 并可能获得真正的理解^④。

这意味着讲述中国故事, 不仅是要发出中国声音, 更重要的是通过讲故事建立不同文明间的可沟通性和对话性, 在故事中体现人类共同价值和普遍关注的话题, 分享人类共同体的意涵, 搭建促进视阈融合的桥梁, 弥合群体间差异的鸿沟。无论对话式还是独白式的故事, 都应具有明显的分享意识和协商意识, 将群体间互动纳入话语结构中, 将他人的话语融入当前话语实践当中, 既做倾听者, 也做表达者。这不仅意味着故事主题的选择上应意识到他人的存在, 对他人可能提出的问题、需要澄清的疑问做出回应, 而且体现在词语的选择和使用上对于作为共同参与者的受众态度的体察。基于此, 本文提出:

研究问题 2: 在这个典型的国际传播实践个案当中, 中国故事具有何种叙事特征? 如何通过中国故事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的价值观?

三、研究方法

(一) 方法选择

本文以中国故事的“第一主讲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

① 参见 Gaertner, S. L. & Dovidio, J. F., *Reducing Intergroup Bias: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Philadelphia, PA: The Psychology Press, 2000。

② 参见 Eder, D., “Developing Adolescent Peer Culture through Collaborative Narration,” in Susan Hoyle & Carolyn Temple Adger, eds., *Kids Talk: Strategic Language Use in Later Childhood*,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82–94; Ochs, E., Smith, R. C. & Taylor, C. E., “Detective Stories at Dinner-time: Problem Solving through Co-narration,” in Charles L. Briggs, eds., *Disorderly Discourse: Narrative, Conflict, and Inequ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95–113; Polanyi, L., *Telling the American Story: A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of Conversational Storytelling*, Cambridge, MA: The Met Press, 1985。

③ 参见 McKee, R., “Storytelling that Moves Peopl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81, no. 6, 2003, pp. 51–55。

④ 参见 Smith, M., “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 by Seymour Chatma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50, no. 3, 1992, pp. 253–254。

国际外交场合讲述的故事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考察这一国际传播实践个案当中中国故事的意义建构功能和叙事表征。本文依据中国故事、外国故事、融通中外的故事、不同主题的故事、故事涵盖的理念、故事中的关键词、提及其他传播主体讲故事的渠道等变量制定编码表,根据 Holsti 信度体系保证编码的信度,使用 DiVoMiner 文本数据挖掘与分析平台对样本进行分析。

(二) 样本与分析单位

本文采取普查的方式,数据来源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习近平在国际外交场合的系列讲话,抽样框以 2013 年至 2019 年这一时间跨度来衡量^①,分析单位和观测单位为其在国际外交场合发表的主旨演讲、署名文章、讲话、致辞、函电以及接受媒体采访的内容。筛选过程中遵循两个标准:第一,出于研究的需要,样本须是习近平以第一人称发表的,排除该网站系列讲话中所有转述和新闻报道的内容。第二,在此基础上,样本须覆盖抽样框时间内习近平在国际外交场合发表的全部演讲、文章、讲话、致辞、函电及采访内容(以下简称为“国际讲话”)。首先,以该网站中的“讲话”类型为检索依据,收集国际讲话样本,排除其中国内讲话部分。其次,通过标题和内容检索发现,该网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国防”和“外交”各个栏目下仍有初筛未涵盖的国际讲话内容。为避免漏检,对于以上各栏目下的全部讲话进行逐一查阅,对初筛样本进行补充和完善。同时进行数据清理,筛选掉经两次检索后具有不同标题但相同正文的重复内容。最后获得习近平系列国际讲话样本 207 篇。

(三) 编码类目建构

在充分研读样本的基础上,本文的编码除了包含讲话的发表时间、地点、标题、篇幅等基本分析单位外,主要设置以下几个方面的变量:

首先,考察国际外交场合讲话中故事的总体情况和各主要体裁中故事的各自分布情况。本文将故事分为中国故事和外国故事两个类别,通过检视每篇国际讲话中是否包含中国故事和(或)外国故事,考察讲故事在系列国际讲话中所占的比重。具体而言,中国故事的操作化定义为是否包含中国典故、是否包含中国历史故事、是否包含中国现当代故事、是否包含中国现当代名句谚语;外国故事的操作化定义为是否包含外国历史故事、是否包含外国现当代故事、是否包含外国名句谚语,共包括 7 个二分变量(1 = 包含故事,0 = 不包含故事),并在此基础上,收集选定涵盖故事的国际讲话样本。

同时,采用以上中国故事和外国故事的分类标准考量主旨演讲、署名文章、讲话等各主要体裁中故事的各自分布情况,包括 1 = 主旨演讲,2 = 署名文章,3 = 讲话,4 = 致辞,5 = 函电,6 = 媒体采访,7 = 发言,并在此基础上,收集选定各主要

^① <http://jhsjk.people.cn/result/7?area=402>。

体裁中涵盖故事的国际讲话样本。

其次,探查国际讲话中中国故事对于中国人的群体身份建构以及理解中国人的群体身份所发挥的作用。将涵盖故事的国际讲话按照是否包含中国典故、中国历史故事、中国现当代故事、中国现当代名句谚语几个类目进行编码录入。

1. 中国典故:考察涵盖故事的国际讲话中引用中国典故所占的比重(1=是,0=否)。

2. 中国历史故事:考量国际讲话中借用中国历史故事所占的比重(1=是,0=否)。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期标准,将关于在从中国古代原始社会到1840年中国古代史时期内和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史时期内的故事统称为中国历史故事。

3. 中国现当代故事:检视国际讲话中借用中国现当代故事所占的比重(1=是,0=否)。根据对于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分期标准,将关于在从1949年至今中国现当代史时期内的故事统称为中国现当代故事。

4. 中国现当代名句谚语故事:考察国际讲话中引用中国现当代名句谚语所占的比重。这里的中国现当代名句谚语指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名句、广为流传的中国民间谚语、俗语,以及脍炙人口的中国歌曲中的经典歌词。一篇讲话可能同时包含中国现当代名句和谚语,因此在研究设计中将该变量设为多项选择题。

第三,探析国际讲话中中国故事的叙事特征以及中国故事对阐释人类共同体共享价值观的作用。将涵盖故事的国际讲话按照是否包含外国历史故事、外国现当代故事、外国名句谚语、融通中外的故事、不同主题的故事、故事涵盖的理念、故事中的关键词、提及其他传播主体讲故事的渠道几个类目进行编码录入。

1. 外国历史故事:研究国际讲话中借用外国历史故事所占的比重(1=是,0=否)。需要说明的是,史学界对于世界史的分期问题做出了多样化的表述,本文参照其中有代表性的分期标准,将关于在从远古人类起源到公元1640年世界古代史时期内和从1640年到1917年世界近代史时期内的故事统称为外国历史故事。

2. 外国现当代故事:检视国际讲话中借用外国现当代故事所占的比重(1=是,0=否)。遵循史学界对于世界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分期标准,将关于在从1917年到1945年世界现代史时期内和从1945年至今世界当代史时期内的故事统称为外国现当代故事。

3. 外国名句谚语故事:考量国际讲话中引用外国名句和谚语所占的比重。这里的外国名句指的是,外国文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民族英雄的名言警句以及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名言警句。外国谚语指的是,广为流传的外国民间谚语、俗语,以及脍炙人口的外国歌曲中的经典歌词。

4. 融通中外的故事:考察国际讲话中同时包含中国故事和外国故事的条目所占的比重(1=是,0=否)。这里融通中外的故事指的是,一篇讲话至少包含一个中国故事和一个外国故事。

5. 不同主题的故事: 探析不同主题的故事在讲话样本中的分布情况, 主要包括 1 = 人民友好故事, 2 = 国家交往故事, 3 = 文化融通故事, 4 = 历史情感故事, 5 = 亲历故事, 6 = 其他。一篇讲话包含的故事主题可能超过一个, 故而在研究设计中将该变量设为多项选择题。

6. 故事涵盖的理念: 检视故事中中国特色外交理念各维度的分布情况, 主要包括 1 = 中国梦, 2 = 合作共赢, 3 = 正确义利观, 4 = 安全观, 5 = 美美与共的文化共生理念, 6 = 和平发展道路, 7 = 生态观, 8 = 命运共同体, 9 = 其他。一篇讲话涉及的外交理念可能超过一个, 因此将该变量设为多项选择题。

7. 故事中的关键词: 检测故事中所使用的高频词汇以及使用频率。基于字符串类型设计, 通过将故事中的关键词提取出来, 来探查故事中使用次数最多的词汇、形容词、体现相互间关系的词汇及其使用频率。

8. 提及其他传播主体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渠道: 考察涵盖故事的国际讲话中是否提及其他传播主体讲故事的渠道 (1 = 是, 0 = 否)。在此基础上, 考量提及其他传播主体讲故事不同渠道的分布情况, 包括 1 = 教育合作与学术交流, 2 = 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来华留学, 3 = 来华培训研修, 4 = (前) 政治家外交家交流, 5 = 青少年交流, 6 = 地方交流, 7 = 媒体交流, 8 = 智库交流, 9 = 非政府组织交流, 10 = 文化交流, 11 = 教育服务, 12 = 医疗减贫援助, 13 = 旅游促进计划, 14 = 孔子学院, 15 = 体育交流, 16 = 侨胞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使者, 17 = 政府交往, 18 = 中国企业作为中国名片。鉴于一篇讲话所提及的渠道可能超过一个, 因此该变量设为多项选择题。

(四) 编码和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 DiVoMiner 文本数据挖掘与分析平台机器自动编码和人工校对编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析, 编码工作历时近四周, 由作者和另一个编码员共同完成。为了避免在解读系列国际讲话样本时可能存在的理解问题和主观倾向, 在对所有样本进行编码之前, 先从总样本中随机选取 40 篇由两个编码员各自独立进行编码, 对于编码的结果进行比照, 根据 Holsti 方法计算交互信度为 0.90。对于少数不一致的地方, 进行重新研读, 确定其归属的信息类型并赋值。在此基础上, 继续完成后续样本的编码工作。

四、研究发现

(一) 讲故事在习近平国际讲话中具有重要地位

1. 故事在国际讲话中所占的比重

总体而言, 抽样框 2013 年至 2019 年这一时间跨度内习近平在国际外交场合发表的主旨演讲、署名文章、讲话、致辞、函电以及接受媒体采访的内容合计 207 篇。在 207 篇样本中, 涵盖故事的国际讲话为 165 篇, 占总样本的 79.71%。如表 1 所示。

表 1 故事在国际讲话中所占的比重

年度	国际讲话数量 (篇)	涵盖故事的国际讲话数量 (篇)	故事在国际讲话中的比重 (%)
2013	24	17	70.83
2014	42	39	92.86
2015	46	37	80.43
2016	32	27	84.38
2017	28	21	75
2018	22	18	81.82
2019	13	6	46.15
合计	207	165	79.71

2. 故事在不同体裁的国际讲话中所占的比重

就体裁而言,主旨演讲、署名文章、致辞和讲话中故事所占的比例较高。其中,41 篇主旨演讲全部包含故事的内容,署名文章中故事所占比例接近 100% (46 篇中有 45 篇),致辞 (16 篇中有 13 篇)、讲话 (52 篇中有 42 篇)、发言 (10 篇中有 8 篇) 和媒体采访 (9 篇中有 7 篇) 中故事所占比例均达到或接近 80%。

基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讲故事在习近平国际外交场合的讲话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 207 篇国际讲话样本中,有 165 篇讲话包含故事的内容,约占总样本的五分之四。同时,故事在主旨演讲、署名文章、致辞、讲话等各主要体裁的各自比例分布均达到或接近 80%。

(二) 讲述“贯通古今的中国故事”是习近平讲故事的显著特征

1. 中国典故所占比重

涵盖故事的 165 篇国际讲话当中,有 135 篇引用了中国典故的内容,占比 81.82%,即涵盖故事的国际讲话中近 80% 引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

2. 中国历史故事所占比重

讲故事样本中,有 70 篇讲话至少包含一个中国历史故事,在样本中所占比例为 42.42%,即在国际场合讲述的故事中,超过五分之二的故事包含中国历史故事的内容。

3. 中国现当代故事所占比重

讲故事样本中,有 84 篇讲话至少包含一个中国现当代故事,在样本中所占比例为 50.91%。即在涵盖故事的国际讲话中,超过一半的讲话包含中国现当代故事的内容。

4. 中国现当代名句谚语故事所占比重

讲故事样本中,有 21 篇讲话至少包含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名句 (占比

12.73%)，22篇讲话至少包含一个中国现当代谚语（占比13.33%），即包含中国现当代名句和中国现当代谚语的讲故事样本均超过10%。另外，就整体而言，将包含与不包含此类名句谚语的样本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超过五分之一涵盖故事的国际讲话（22%）中引用了中国现当代名句谚语的内容。

以上结果显示，在涵盖故事的国际讲话当中，讲述中国故事处于显著地位。首先，超过五分之四的讲话（135篇）引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这说明中国典故在习近平国际外交场合讲故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其次，中国历史故事、中国现当代故事在国际讲话中占较大的比重。超过五分之二的讲话（70篇）至少包含一个中国历史故事，超过一半的讲话（84篇）至少包含一个中国现当代故事，这说明讲述中国历史故事、中国现当代故事在习近平国际外交场合讲故事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与中国历史故事相比，中国现当代故事所占比例更高。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名句（著作名）和中国现当代谚语（包括谚语、俗语、歌词）也是习近平在国际外交场合讲故事时经常引用的内容。总体而言，习近平在国际外交场合发表的演讲、文章、讲话、致辞、函电及接受采访时往往引用中国典故，讲述中国历史故事、中国现当代故事，引用中国现当代名句谚语，讲述“贯通古今的中国故事”是习近平在国际外交场合讲故事的显著特征之一。以往研究显示，叙事的风格（style）和内容（substance）本身即存在种族间和地域间的差异^①。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中国社会文化语境所提供的故事文本资源可以被视为阐释“深层集体记忆”的“文化工具”，是中国人自我呈现和身份呈现的重要资源。

（三）讲述“贯通古今的外国故事”和“融通中外的故事”是习近平讲故事的鲜明特征

1. 外国历史故事所占比重

讲故事样本当中，有44篇讲话至少包含一个外国历史故事，占比26.67%。这说明，超过四分之一的国际讲话包含外国历史故事的内容。

2. 外国现当代故事所占比重

讲故事样本当中，有82篇讲话至少包含一个外国现当代故事，占比49.70%，将近一半的讲故事样本涵盖外国现当代故事的内容。

3. 外国名句谚语故事所占比重

讲故事样本当中，45篇讲话至少包含一个外国文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政

^① 参见 Michaels, S., "Sharing Time: Children's Narrative Styles and Differential Access to Literacy," *Language in Society*, vol. 10, 1981, pp. 423-442; Gee, J.,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Narrative,"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vol. 1, 1991, pp. 15-39; Minami, M., & McCabe, A., "Haiku as a Discourse Regulation Device: A Stanza Analysis of Japanese Childrens' Personal Narratives," *Language in Society*, vol. 20, 1991, pp. 577-599; Blum-Kulka, S., "You Gotta Know How to Tell a Story: Telling, Tales, and Tellers in American and Israeli Narrative Events at Dinner," *Language in Society*, vol. 22, 1993, pp. 361-402; Bauman, R., *Story, Performance, and Event*,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Johnstone, B., *Stories, Community, and Pla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要、国际组织负责人、民族英雄的名言警句以及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名言警句，占比 27.27%。48 篇讲话包含外国民间谚语、俗语、脍炙人口的外国歌曲中的经典歌词，占比 29.09%。即引用外国名句和外国谚语的讲故事样本均超过四分之一。

4. 融通中外的故事所占比重

在 165 篇涵盖故事的国际讲话中，有 80 篇讲话至少包含一个中国故事和一个外国故事，同时包含中外故事的讲话占样本总量的近一半（占比 48.48%）。

以上结果表明，在涵盖故事的国际讲话当中，讲述外国故事和“融通中外的故事”处于重要地位。其一，超过四分之一的样本（44 篇）包含外国历史故事，将近一半（82 篇）包含外国现当代故事。相比而言，讲述外国现当代故事的频率高于外国历史故事。其二，引用外国名句和外国谚语的讲故事样本均超过四分之一（分别为 45 篇和 48 篇）。整体而言，习近平在国际外交场合发表的演讲、文章、讲话、致辞、函电及接受采访时往往讲述外国历史故事和外国现当代故事，这表明讲述“贯通古今的外国故事”是习近平在国际外交场合讲故事的特点。同时，近一半的讲话（80 篇）既包含中国故事，也包含外国故事，这表明讲述“融通中外的故事”是习近平在国际外交场合讲故事的鲜明特征。以上结果揭示，习近平讲故事这一中国故事国际传播实践个案丰富和延展了中国故事的内涵要义和话语表述。结合讲述“贯通古今的外国故事”和“融通中外的故事”这两个鲜明特征本文认为，这一个案反映了中国故事如何将外国故事融入自身文本的建构当中，体现出多声部、多种声音共现的故事文本资源以及中国故事与外国故事之间的互动与对话关系。

（四）故事主要包含五大主题，“国家交往”和“人民友好”是最突出的主题

不同主题的故事的分布情况显示，习近平在国际外交场合所讲故事的主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主要包含“人民友好”、“国家交往”、“文化融通”、“历史情感”和“亲历故事”五大主题。其中，多数讲话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故事主题，“国家交往故事”和“人民友好故事”是突出的主题。“国家交往故事”共 126 篇，约占总样本的四分之三。“人民友好故事”为 56 篇，约占总样本的三分之一。“历史情感故事”（54 篇）、“亲历故事”（30 篇）和“文化融通故事”（26 篇）也是样本中频繁出现的主题。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国家交往”和“人民友好”两大突出主题反映了中国提出的体现主体间性关系的文明交往原则；其二，“国家交往故事”是解惑释疑、扩大共识、凝心聚力的纽带，“人民友好故事”是增进理解、建立互信、发展友谊的桥梁。

（五）故事主要涵盖八大外交理念，“命运共同体”是最具代表性的理念

研究结果显示，习近平在国际外交场合讲述的故事主要涵盖“中国梦”、“合作共赢”、“正确义利观”、“安全观”、“美美与共的文化共生理念”、“和平发展道路”、“生态观”、“命运共同体”八大外交理念。其中，多数讲话涵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理念，“命运共同体”是最有代表性的理念。如表 2 所示，“命运共同体”是习

习近平在国际外交场合讲故事时提及最多的理念，占样本总量的近 65%。其次为“合作共赢”，占比近 50%。在国际外交场合讲故事时同时传达了“和平发展道路”、“美美与共的文化共生理念”、“中国梦”、“正确义利观”、“安全观”和“生态观”等外交理念。研究表明，习近平将“道”贯穿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当中，将中国历史文化之“道”、改革开放之“道”、大国外交之“道”升华为“共同体”层面的人类经验。

表2 中国特色外交理念在讲故事样本中的分布情况

故事涵盖的外交理念	提到某一外交理念的讲话篇数 (篇)	某一外交理念在讲故事 样本中的分布情况 (%)
命运共同体	108	65.45
合作共赢	83	50.30
和平发展道路	41	24.85
美美与共的文化共生理念	26	15.76
中国梦	23	13.94
正确义利观	19	11.52
安全观	18	10.91
生态观	12	7.27

(六) 故事里最常出现的词汇为“发展”、“中国”、“我们”和“人民”，最常用的形容词为“友好”和“和平”，故事中体现相互间关系的常用词汇为“我们”

基于字符串类型设计，通过将故事中的关键词提取出来，来检测故事中所使用的高频词汇以及使用频率。频率分析显示，使用次数最多的词汇是“发展”，使用了144次。其次为“中国”，出现了139次。“我们”、“人民”分别使用了123次和122次，如图2所示。讲故事样本中的“我们”往往涵盖“人类共同体”、“中国和对方国家”、“中国人民和对方国家人民”、“中国领导人和对方国家领导人”、“中国人民”等几个主要语义。



图2 故事中所使用的高频词汇以及使用频率

故事中最常用的形容词为“友好”、“和平”、“重要”、“美好”、“开放”和“积极”。故事中体现相互间关系的常用词汇为“我们”、“两国”、“各国”、“两国人民”、“相互”、“朋友”、“携手”和“伙伴”。故事中常用的形容词及使用频率、故事中体现相互间关系的常用词汇及使用频率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表 3 故事中常用的形容词以及使用频率

高频形容词	使用次数	高频形容词	使用次数
友好	77	伟大	40
和平	70	美丽	33
重要	70	深厚	32
美好	61	重大	25
开放	57	平等	23
积极	46	和谐	21

表 4 故事中体现相互间关系的常用词汇以及使用频率

词汇	使用次数	词汇	使用次数
我们	123	各国人民	44
两国	76	双方	41
各国	72	一起	33
两国人民	60	一道	33
相互	59	互信	27
朋友	56	兄弟	21
携手	49	彼此	21
伙伴	48		

结果显示，其一，“中国”和“发展”这两个故事中最常用的高频词汇表明，涵盖这些词汇的中国故事具有自我呈现、身份呈现和身份建构的功能，揭示了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及实现目标。其二，故事中最常用的体现相互间关系的词汇“我们”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文化观，通过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以及紧密的联系与互动。其三，故事中最常用的两个形容词“友好”和“和平”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与实现方式，把人类引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前瞻未来。

（七）超过半数的讲故事样本既包含故事，也提及其他传播主体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渠道

研究发现，除了亲身讲述故事以外，习近平还在国际讲话里提及其他传播主体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渠道。有 85 篇涵盖故事的国际讲话提及了各种渠

道，占比超过一半。提及的渠道主要包括教育合作与学术交流、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来华留学、来华培训研修、（前）政治家外交家交流、青少年交流、地方交流、媒体交流、智库交流、非政府组织交流、文化交流、医疗减贫援助、旅游促进计划、孔子学院、体育交流、侨胞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使者、政府交往、教育服务以及中国企业作为中国名片共十八个类别，其中提及次数最多的是“文化交流”、“旅游促进计划”和“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来华留学”三种人文交往和人文合作渠道，详见表5。这一结果说明，随着中外人文交往和人文合作的不断深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和传播中外友谊的使者。

表5 讲故事样本中提及其他传播主体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渠道的分布情况

渠道	提及的次数	渠道	提及的次数
文化交流	44	地方交流	10
旅游促进计划	37	（前）政治家、外交家交流	8
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来华留学	30	医疗减贫援助	8
青少年交流	28	智库交流	6
来华培训研修	24	体育交流	5
媒体交流	18	非政府组织交流	3
孔子学院	17	教育服务	2
政府交往	14	中国企业作为中国名片	1
教育合作与学术交流	12	侨胞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使者	1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考察“第一主讲人”习近平在国际外交场合讲述的中国故事可以发现，中国故事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不仅揭示中国人这一群体原型的典型身份特征，而且有助于使国际受众更深入地洞察历史和现在的中国，并对未来中国的预期和想象提供隐喻和可能的方向。融通中外的故事具有“对话性”和“主体间性”的叙事特征，讲述这些故事有助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彼此间的连接，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困惑和偏见，融会“既中国又世界”的价值观念体系。国际传播语境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故事的主讲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叙事不仅为中国故事的叙述提供了视角，而且为中国故事的书写提供了源泉。那些承载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中国故事、反映不同文明交相辉映和交流互鉴的融通中外的故事，是增进中外人民相互了解和认知、推动不同文明对话、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力量。

（一）中国故事的身份建构功能

讲述个体的生活故事必然涉及将个体的人内话语（inner speech）转换为社会话

语 (social speech)^①。在建构自我身份时,个体所使用的文化和历史资源是不可或缺的赋权 (empowering) 和规约 (constraining) 工具^②,是勾连和融合人内话语和社会话语的重要叙事资源。用于书写叙事的文化和历史资源总有被前人所使用的历史,因而叙事总有属于别人的那一部分成分^③,这便引出一个问题:故事讲述者如何运用恰当的叙事资源使自己的声音与前人的声音保持协调一致?

有学者将基于为生活提供整体感和目的性的生活故事而形成的被个体所内化的、不断演进的身份称为叙事身份^④。通过讲故事人们创造一个“故事世界”,以一种符合社会和文化期待的方式来呈现自我、对自我进行社会角色定位,叙事身份因此成为个体世界与社会文化世界之间的连接点^⑤。个体通过话语对身份形成认知,以贯穿整个生命历程的个体叙事的建构和重构将身份呈现出来,通过社会互动和社会实践对其进行书写,且将其书写在社会互动和社会实践当中^⑥。叙事身份的形成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以文化为中介的。人们所讲述的故事来源于人们所处的生活和世界,因而成为该文化经典的各种变体^⑦。中国典故和中国历史故事记录着中国的历史变迁情景以及这种变迁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标识。讲述中国典故和中国历史故事可以呈现和再现中华民族的过去经历、文化传统、民族智慧和生存哲学,阐释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体系和民族精神。这一历时维度是中国故事的核心构成要素,它反映了中国故事的传统性。

叙事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变化无常的;它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零散分布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却能够在特定的语境下统合在一起^⑧。虽然 narrative 和 narration 都可以用来指代“叙事”,但在语义上存在差异。narrative 指将自我置于目的的空间里来探讨叙事一成不变的涵义, narration 则指借助故事来叙述自我已经履行的和正在进行中的象征行为^⑨。使用 Narration 这个词有助于强调叙事是正在进行

① Hammack, P. L., "Narrative and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12, no. 3, 2008, pp. 222 - 247.

② Penuel, W. R., & Wertsch, J. V., "Vygotsky and Identity Formation: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vol. 30, no. 2, 1995, p. 90.

③ Bakhtin, M.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 M. Bakhtin*, in Michael Holquist, ed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 293.

④ McAdams, D. P., & McLean, K. C., "Narrative Identit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2, no. 3, 2013, p. 233.

⑤ Bruner, J., "Autobiography as Self," in Jerome Bruner, eds.,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33 - 66.

⑥ Hammack, P. L., "Narrative and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12, no. 3, 2008, pp. 222 - 247.

⑦ Bruner, J., "Life as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 vol. 71, no. 3, 2004, pp. 691 - 710.

⑧ Bamberg, M., "Who Am I? Narra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Self and Identity," *Theory & Psychology*, vol. 21, no. 1, 2011, pp. 3 - 24.

⑨ Bamberg, M., "Who Am I? Narra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Self and Identity," *Theory & Psychology*, vol. 21, no. 1, 2011, pp. 3 - 24.

中的行为和活动，而非仅作为最终的文本产物。中国故事是不断再生产的持续性过程，中国故事不仅反映中国人已经经历的生活，而且还应记录中国人正在经历的生活。中国现当代故事和中国现当代名句谚语故事承载着现当代语境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折射出中国人民的抱负和对梦想的向往与追求。这一共时维度是中国故事的核心构成要素，它体现了中国故事的现代性。

“叙事范式” (narrative templates) 是叙事表征的概括性结构。它基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以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文化工具 (cultural tools) 为中介，能够生成反映同一主题的众多具体叙事，故事与故事之间在版本和表达上相协调、相一致，每一个独立的故事统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表达其背后深层次的共同文化表征^①。可以说，叙事范式在塑造“群体中的记忆” (memory in the group) ^②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讲述同一主题的具体叙事过程中担任着“共同叙述者” (co-author) 的角色。中国历史故事和中国现当代故事的意义建构功能在于它们可以被视为国际传播语境当中中国人建构和维系身份的“叙事范式”。通过讲述中国故事，中国人“找回了自己”、“成为了自己”。讲述中国故事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在清晰地自我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的“全面、客观、立体”的自我描述与自我表达^③。这一叙事范式可以阐释为：中国故事 $Z = \text{中国故事的传统性 } Z_1 (\text{中国典故 } Z_{1-1} + \text{中国历史故事 } Z_{1-2}) + \text{中国故事的现代性 } Z_2 (\text{中国现当代故事 } Z_{2-1} + \text{中国现当代名句谚语故事 } Z_{2-2})$ 。同时，中国故事正在发生并且一直延续到未来，中国现当代故事是在继承中国历史故事的条件下产生和延展的，未来的中国故事也将是在中国历史和现当代故事的基础上延续和发展。因此，在国际传播语境当中，中国故事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不仅揭示中国人这一群体原型的典型身份特征，而且有助于使国际受众更深入地洞察历史和现在的中国，并对未来中国的预期和想象提供隐喻和可能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叙事范式并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型，相反，它们往往基于特定的叙事传统，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以一种“非慎思、无意识”的方式存在^④。学者们认为，在任何社会当中，社会文化语境所提供的文本资源在叙述事件时都担任着“共同叙述者”的角色，尤其体现在那些超出个体所处时代的历史事件上。因此可以说，叙事范式是表达“群体中的记忆”，揭示群体身份的重要载体，同时在群体的形成、群体的社会建构中也发挥着作用。

① Wertsch, J. V., "The Narrativ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ETHOS*, vol. 36, no. 1, 2008, p. 120.

② Bartlett, F. C.,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p. 294.

③ 参见张毓强、黄珊《中国：何以“故事”以及如何“故事”——关于新时代的中国与中国故事的对话》，《对外传播》2019年第3期，第53-56页。

④ Bartlett, F. C.,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32], p. 45.

（二）融通中外故事的“对话性”和“主体间性”叙事特征

如何让故事深深刻在记忆之中？从受众的视角出发，把注意力放在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上往往是讲述者应该思考的问题^①。国际传播语境当中讲述故事是不同文化间的交互及融通^②，这就意味着讲述中国故事不仅应包含具有民族身份特征的叙事维度，而且还要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在历时和共时的维度挖掘和凝练中外群体间交往中体现人类共享价值观的故事，通过讲述融通中外的故事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涵，融会“既中国又世界”的价值观念体系。

1. 融通中外故事的“对话性”叙事特征

共同建构（co-construction）指的是对立场、行为、身份、情感或其他具有文化意义的现实的共同创造（joint creation）。故事不是由讲述者单独创作的单声部的“声音”，而是多声部、多种声音的共现（multivoicedness）。听者（受众）可以被视为是故事的共同作者^③，故事的共同叙述（co-narration）对于叙事的结构和目标起着决定作用^④。它不仅以与受众之间过去、现在的对话或者头脑中假设的与某的对话为基础，同时也将其他时空里所产生的口头和书面故事文本融入到当前故事文本的建构当中，从而形成当前文本与之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对话关系。

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的“可讲述性”不在于提供新的信息量，而在于故事内容本身的熟悉感为讲述者和受众提供了这种对话的机会。在国际传播语境当中，讲述融通中外的故事隐含着讲述者和受众间的对话，将讲述者和受众都视为故事的主人公，融合双方视角和价值观，确认共享的纽带，拉近心理距离。独白式的国际讲话也可以创设这种对话形式，将内群体的故事建立在其他群体故事的基础上，通过借用和引用其他群体的故事扩大对话的空间。

其一，通过讲述融通中外的故事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彼此间的连接。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群体分类隐含着对自身所属群体的关注，增加了对内外群体间差异性以及外群体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的感知。在国际传播语境当中，讲述融通中外的故事有助于增加对内外群体相似性的感知，将对内外群体分类的感知转化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知，凸显不同群体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和紧密的互动。中国故事为中国

① 参见〔美〕威廉·E. 布隆代尔《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徐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第1页。

② 参见徐明华、李丹妮《情感畛域的消解与融通——“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沟通介质和认同路径》，《现代传播》2019年第3期，第38页。

③ Sacks, H., "An Analysis of the Course of a Joke's Telling," in Richard Bauman & Joel Sherzer,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37-353; Sacks, H.,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2 vols.), in Gail Jefferson, eds., Oxford: Blackwell, 1992; Watson, K. A., "Transferable Communicative Routines: Strategies and Group Identity in Two Speech Events," *Language in Society*, vol. 4, no. 1, 1975, pp. 53-72; Tannen, D., "The Effect of Expectations on Conversation," *Discourse Processes*, vol. 1, no. 2, 1978, pp. 203-209.

④ Hymes, D.,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4, pp. 55-58.

人所经历的故事（故事 Z），外国故事为其他国家民众所经历的故事（故事 W），讲述融通中外的故事则将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所经历的故事（故事 Z 和故事 W）融合为两个民族或国家所共享的故事（故事 Z - W），可以被阐释为：融通中外的故事 $R = \text{中国故事 } Z (\text{中国故事的传统性 } Z_1 + \text{中国故事的现代性 } Z_2) + \text{外国故事 } W (\text{外国故事的传统性 } W_1 + \text{外国故事的现代性 } W_2)$ 。融通中外的故事 R 体现了中国故事与外国故事在互动中形成的共同意义，这种共同意义的协商性折射出东方文化的叙事中自我与他者间的“场依存”（place-or ba-dependency）和“场融合”（ba-merging）的关系^①，反映了自我与他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相互连接、彼此联系的特征。通过讲述融通中外的故事有助于打通中外话语壁垒，以开放、包容的文化思维，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的姿态，与世界上各种文明开启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对话，呈现出不同文明交相辉映、相互吸引、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景观与图谱。

其二，通过讲述融通中外的故事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困惑和偏见。无论在对话式还是独白式的故事当中，故事的受众都是故事的参与者。在对话式的故事中，这表现为讲述者和受众间不同观点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持续的衍生式的互动过程。在独白式的故事中，这体现为讲述者会根据头脑中对受众的印象、其所认为的受众所具有的知识 and 言语以及当前的目标来设想受众对自己所讲故事的反馈。也就是说，当讲述者讲述故事（ $Z_{\text{中国故事}}$ ）时设想其受众的反馈，即其可能提出的问题、需要澄清的疑问、可能产生的误解（ $Y_{\text{疑问}}$ ），讲述者以对话的形式与受众的这些反馈进行互动。例如，讲述者对自己的话语提出一个问题或反对意见，之后立即对这一问题或反对意见做出回应；或者将他人的话语融入自己的故事中，在故事中拥有两种声音的对话，一种被认为是受众的声音，另一种是讲述者自己的声音，通过在故事中呈现多种声音、他人的话语，回应受众可能提出的问题和异议，或提供进一步的信息，避免受众可能出现的误解（ $J_{\text{解惑释疑}}$ ）。国际传播语境中融通中外的故事既包含讲述者的话语（ $Z_{\text{中国故事}}$ ），也包含讲述者设想其受众对于讲述者话语的反馈（ $Y_{\text{疑问}}$ ），形成了讲述者对于受众可能出现的反馈的回应（ $J_{\text{解惑释疑}}$ ），可以阐释为：融通中外的故事 $R = Z_{\text{中国故事}} (J_{\text{解惑释疑}}(Y_{\text{疑问}}))$ 。融通中外的故事通过回应国际上因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政策不了解、误解和偏见而产生的困惑和疑虑，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决心，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扩大共识，融会“既中国又世界”的价值观念体系。

2. 融通中外故事的“主体间性”叙事特征

群体间交往中维护积极自尊的基本需求使得人们在将内群体和外群体进行比较时更多地偏爱内群体。语言是社会认知的重要因素，用于指代他人的名称和标识微

^① 参见 Markus, H. R. & Kitayama, Shinobu.,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98, no. 2, 1991, pp. 224 - 253.

妙地反映出人们对他人的印象^①。当使用不同的代词指代他人时，隐含地体现了人们对内群体和外群体分类的基本认知。与指代外群体的人称代词“他们”相比，人称代词“我们”因长期用来指代内群体而获得了积极的语义内涵。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通常被界定为有类似经历的不同主体在观念、视角、立场或经验、理念上的共享^②，是不同主体对于互动现实和社会现实的共同生产^③。人们指代他人所使用的不同人称代词表达了人们对他人的不同态度。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们”能够在无意识中自动激活积极的情感暗示^④，“我们”的自我呈现方式体现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和相似性^⑤。一个国家的集体叙事在维系集体存在安全感（collective existential security）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同国家的集体叙事之间往往不存在相互依赖、彼此呼应的关系。融通中外的故事的另一个特征表现为在讲述故事时使用一个具有包容性语义内涵的内群体代词“我们”来融会以往基于群体分类的内群体代词“我”和外群体代词“你（你们）”各自的语义内涵。“我们”反映了在讲述“我们的故事”过程中，讲述者和受众彼此间相互理解和认同的主体间性关系，通过将内群体“我”和外群体“你”的感知转化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感知，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涵，建立不同国家叙事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融合的关系，可以被阐释为：融通中外的故事 R = “我们”的故事（内群体“我”的故事 + 外群体“你”的故事）。这种叙事特征蕴含着对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超越，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去中心化”的价值体系的特征，并通过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之间紧密的联系与互动，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要义。

（三）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故事的主讲人

所有伟大的故事都来自伟大的创意，在几乎所有伟大的故事创意中，都有人性

① Taylor, S. E., "A Categorization Approach to Stereotyping," in David L. Hamilton, eds., *Cognitive Processes in Stereotyping and Intergroup Behavior*, Hillsdale, NJ: Erlbaum, 1981, pp. 83 - 114.

② Varela, F., Thompson, E. & Rosch, E.,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2; Zlatev, J., Racine, T., Sinha, C. & Itkonen, E., "Intersubjectivity: What Makes Us Human?" in Jordan Zlatev, Timothy P. Racine, Chris Sinha & Esa Itkonen, eds., *The Shared Mind: Perspectives on Intersubjectiv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8, pp. 1 - 14; Verhagen, A., *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scourse, Syntax, and Cogn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Verhagen, A.,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Language System," in Jordan Zlatev, Timothy P. Racine, Chris Sinha & Esa Itkonen, eds., *The Shared Mind: Perspectives on Intersubjectiv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8, pp. 307 - 331.

③ Schegloff, E. A., "Repair after Next Turn: The Last Structurally Provided Defense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Convers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7, no. 5, 1992, pp. 1295 - 1345.

④ Perdue, C. W., Dovidio, J. F., Gurtman, M. B. & Tyler, R. B., "Us and Them: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Intergroup Bia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vol. 59, no. 3, 1990, pp. 475 - 486.

⑤ Taylor, D. M. & Dube, L., "Two Faces of Identity: The 'I' and the 'W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42, no. 2, 1986, pp. 81 - 98.

的展现^①。需要强调的是，除了国家交往的故事，人民友好的故事也是增进理解、建立互信、发展友谊的桥梁。人文交往是中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合作是凝聚中外人民情感的纽带。随着中外间文化、青少年、媒体、地方、智库、体育以及非政府组织交流的不断深入，每个人都是故事的主讲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动听的故事^②，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中外友谊的使者。中国故事也是普通人所讲述的故事，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叙事能够体现中国故事细小而微但又重要的意义，普通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与互动的故事赋予融通中外的故事多元而形象化的内涵，同时，与中国人交往的外国人既基于自己对中国的认知形成对中国故事的理解，又通过人际交往和媒介传播自己对中国的态度。这些不仅为中国故事的叙述提供了视角，而且为中国故事的书写提供了源泉。

同一个故事会因讲述的语境、目标、讲述者、受众的不同而不同^③。讲述故事的重点不仅在于故事内容，而且还在于故事讲述者的特征以及这一特征如何影响讲述者与语境的互动和故事讲述方式的选择。一个社会当中作为意义建构的共同叙事范式，可以在不同情境下通过不同的讲述者以不同的话语形式实现。故事展现了故事讲述者与其所属的特定历史文化的连结、与更为广泛的人类共同体之间的连接，以及不同讲述者在不同叙事语境中的联结，揭示了具有能动性的故事讲述者、多声部的故事文本资源和作为动态社会空间的叙事语境之间的张力。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叙事范式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在于，同一个故事，讲述者不同，交流语境不同，讲述方式会不同；同一个故事，讲述者相同，交流语境不同，讲述方式也不尽相同。相同之处在于，故事不仅反映语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塑造语境。国际传播语境当中，那些承载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中国故事、反映不同文明交相辉映和交流互鉴的融通中外的故事，通过传递“友好”、“和平”、“美好”、“开放”的信息，是增进中外人民相互了解和认知、推动不同文明对话、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习近平讲故事及其对增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8BXW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大连外国语大学汉学院副教授

① （美）威廉·E. 布隆代尔 《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徐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第213页。

② 李希光 《记者如何“讲故事”》，《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4期，第80页。

③ Sherzer, J., “Tellings, Retellings and Tellings within Tellings: The Structuring and Organization of Narrative in Kuna Indian Discourse,” in Richard Bauman & Joel Sherzer, eds., *Case Studies in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Austin, TX: Southwes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 1982, pp. 249–273.

5 • Narrating the Chinese Story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text: Sharing the Notion of Building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rough Storytelling

•Zhao Xin

An abstract concept in the human belief system can manifest itself as detailed stori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orytelling by Xi Jinping in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occasions using content analysis as research method.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tor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identity construction , giving international audience insight into China's history and present , as well as a metaphor for its future. Stories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foreign perspectives are embedded with dialogism and intersubjectivity , helping establish an interconnectednes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people with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t also helps respond to other countries' misunderstandings of and biases towards China , as well as bridging the gap of value system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n the one hand , Chinese stories are invested with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spirit , on the other , stories that integrate Chinese and foreign perspectives show different cultures can learn from and appreciate each other with opennes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text , stories with thes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important forces to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s , expand and intensify cultural dialogues and exchanges , and promote friendships between people with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 thus contributing to building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26 • Openness , Diversity and Independence: The Centenary Transmutation of Communic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Attributes

•Zhao Shuguang Liu Yiming

Althoug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as been interdisciplinary from its inception , comparatively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from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leverages bibliometric methods to illustrate the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ith comparison to that of other disciplin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intained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interdisciplinary openness throughout the full period , but the problem of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diversity and high level of imbalance also goes along with its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However , the changes in the last decade indicated a new phase of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s of communication , with higher level of